



以笔名罗伯特·加尔布雷思著的新书《蚕》——JK·罗琳第二部推理小说年内将推出中文版。小说仍以私家侦探斯特莱克为主角。在这本新作中,斯特莱克将侦查一名小说家的谋杀案。

人民文学出版社今年4月出版的罗琳第一部推理小说《布谷鸟的呼唤》在国内也颇为畅销。在这部小说里,退伍军人出身的私家侦探斯特莱克侦查的是一个当红年轻女名模的意外死亡案件。对时尚圈的准确拿捏,以及这一行业的人情世故的描摹是作家在叙述案子时必须具备的,这方面,罗琳显示了职业作家的水准。奢侈与空虚、创意与混乱、欲望与绝望,时尚偶像——“万人迷”们的生活,生动的画面、对白、心理分析具有娴熟的电影感。想来,下一部,将笔端对准写作行业,罗琳更会得心应手。

罗琳的第一部推理小说

◎ 南妮

《布谷鸟的呼唤》小说一开始,写斯特莱克的女助手罗宾去应聘快要破产的私家侦探的秘书一职,就相当吸引人。罗琳显示了大作家落在小说闲笔处那种举重若轻的幽默与才情。

卢兰·兰德里,凭着狂野与美貌获得时尚界超级巨星的光环,有一天半夜,她在自己高级住宅区的顶楼坠楼死亡。警察的结论是自杀。卢兰的哥哥布里斯托走进快要歇业的斯特莱克办公处,拿出优厚资金,要求他能查出妹妹的真正死因,他不相信她死于自杀。布里斯托的弟弟查理是斯特莱克幼时的要好同学与朋友,10岁时,查理在威尔士度假,在采石场边上骑车,结果从悬崖上摔下死亡。当斯特莱克无法把大美人卢兰与长得活像兔子的布里斯托作为同胞兄妹作联想时,布里斯托告诉斯特莱克,他们三兄妹都是被富人家领养的。卢兰正是查理死后,为医治绝望,被母亲收养的有非洲裔血统的女孩。卢兰被星探发现成为炙手可热的名模后,一心想寻找自己的非洲血亲,与养母疏远,而她的死亡更给养母以重创。

斯特莱克从卢兰死亡前一天的踪迹,来往的人、电话记录、

及她写了什么的一张蓝色信纸着手侦查。在他调查卢兰的朋友、黑人姑娘罗谢尔之后,罗谢尔突然沉尸河中心。她和罪犯都知道蓝色信纸上的秘密,而贫穷的罗谢尔想以此敲诈罪犯,但结果却丧了命。

这似乎是一出迷惑心智的无头案,谁也没有杀人动机,盛名之下因颓靡空虚而自杀是最好的解释,所有人都以为要找出凶手的布里斯托是神经病。然而,始终不露声色的斯特莱克揭示了谜底:杀人凶手正是布里斯托本人!因为财务危机使他贪恋卢兰的财产。在知道卢兰亲手下下把遗产全部留给同母异父的非洲裔兄弟之后,布里斯托潜伏于卢兰家中,深夜伺机把她推下了楼,并藏起了那张蓝色信纸。斯特莱克精彩地推断布里斯托变态的人格,他从小不受父母重视,嫉妒受宠爱的查理与卢兰,而所谓查理掉下悬崖,竟然也是他下的毒手。人性的黑洞比死亡连锁案更令人惊悚——优秀的侦探小说家常着力于此。

小说的悬念设置得不错,而在情节的发展中,罗琳对英国时尚街区、各色酒吧,人声喧嚷的苏荷区的从容描写也是她所醉心的。她以

后系列小说的主人公斯特莱克的形象,也是竭力想要读者对其产生好感。斯特莱克的落泊,很容易使人有亲切感。战争使他断了一条腿,但他永远竭力维持作为正常人的体面与自尊。

斯特莱克豪门背景的女友抛弃了他,他们的结合本就阴差阳错。小说花不少笔墨写这段关系。斯特莱克的女友,可以认作是另一个卢兰。她们像一枚分币的两面。在人生之路上,她们都要寻找自己阶层的归属感。卢兰,奋斗拼搏,最终仍然昙花一现。与富贵生活无缘,连命也没保住。斯特莱克的女友,一心想叛逆自己的贵族阶层,但回归的速度比自己意料的还快。

小说的文学意味似乎比推理技巧更耐琢磨。对于斯特莱克的感情世界——对女助手的欣赏与感激,对布里斯托的疑惑,乃至对整个调查案件过程中所遇人士的好恶,罗琳克制的笔调都为小说营造了一份英式优雅。

《布谷鸟的呼唤》在英美上市后获得作家和媒体的一致好评,被认为是“一部才智焕发的小小说”。但是,38万字的小小说还是显得冗长,如果能够在篇幅上精简一些似乎更好。

新书推荐

《寂静的春天》蕾切尔·卡逊著,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

这是一本引发了全世界环境保护事业的书中,书中描述人类可能将面临一个没有鸟、蜜蜂和蝴蝶的世界。作者是美国海洋生物学家蕾切尔·卡逊,于1962年出版。正是这本不寻常的书,在世界范围内引起人们对野生动物的关注,唤起了人们的环境意识,这本书同时引发了公众对环境问题的注意,促使环境保护问题提到了各国政府面前,各种环境保护组织纷纷成立,从而促使联合国于1972年6月12日在斯德哥尔摩召开了“人类环境大会”,并由各国签署了“人类环境宣言”,开始了环境保护事业。《寂静的春天》出版两年之后,作者因患病与世长辞。

《看,这个世界》V.S.奈保尔著,南海出版社出版

《看,这个世界》是诺贝尔文学奖得主V.S.奈保尔观察和感受这个世界的方式。他说:“我已经说过,我很早就意识到存在着不同的观察方式,因为我是从很远的地方来到大都市。严格说来,可能还有另一个原因,那就是我找不到一个过去,一个我可以进入和考虑的过去,这种缺失让我感到痛心。”一位作家在小说中所体现的细节和情感,往往比他自己所知道的还要多。这些生活中的细节可能包括了当时的社会环境、风俗和人们的日常生活形态,并由此可推测当时人们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模式。这在某种程度上具有现代性和史学价值。而作家的价值判断不一定合每位读者的胃口。作者可能陷于狭隘和刚愎自用,也可能有失偏颇。奈保尔这么认为。

《从徐霞克到梵高》余光中著,国际文化出版公司

此书是余光中继《掌上雨》和《分水岭上》之后的第三本纯评论文集。其中的十四篇文章,一半写于香港,一半写于高雄;最早的一篇写于1981年,最晚的则写于1993年。书名《从徐霞客到梵高》,因为其中有四篇文章析论中国的游记,另有四篇探讨梵高的艺术,占的分量最重。游记既为散文的一体,往往兼有叙事、写景、抒情、议论之功,因此论游记亦即论散文。

《玫瑰与革命:我的丈夫切·格瓦拉》(古巴)阿莱伊达·马奇著,北京联合出版公司出版

这是阿莱伊达·马奇人生中第一次回忆丈夫切·格瓦拉的往事。她讲述了他们过去那惊心动魄的浪漫往事——从他们第一次在古巴反抗战争中以游击队员身份相见的场景到十年后得知切在玻利维亚惨遭暗杀的悲痛时刻。作为切的遗孀,阿莱伊达充满激情,同时也饱含辛酸地写下了这本关于他们夫妻二人对未来的家庭的政治梦想。书中有100多张切·格瓦拉与妻子和孩子的亲密照片,包括切和阿莱伊达在一起的最后时刻。书中还有切为妻子写的诗。

“追随三部曲”的终结篇

◎ 李寅初

时隔六年,路内“追随三部曲”的终结篇《天使坠落在哪里》终于面市了。自从三年前读到路内的小说,我就一直惦记着那个既有着社会青年的混乱,又有着文艺青年的迷惘的主人公“路小路”,想象着他在“少巴”“追随”之后,又会有怎样的故事。

如今,在“天使”里,路小路回来了。这一次,时间流逝到了90年代,故事依然发生在“戴城”,他有了两个新的朋友:杨迟、小苏。这三个“无所事事”的年轻人,在福利院认养了小女孩戴黛后,经

历了一系列故事:失业、失恋、绑架、卖黄碟、卖婚纱、讨债……

“天使”的故事充满了浓浓的救赎气息。三个内心困顿的年轻人,面对着急剧变化的时代,追寻着一个遥不可及的“黄金海岸”。他们的天使是孤儿“戴黛”,因为这个认养,他们的孤独变得温暖,灵魂也似乎得到了慰藉与安放。然而,这个“天使”最终却被美国人花1000美元领养走了。

这样的故事读起来,让我一度感到惶惑。坦率地说,相比于“天使”,我更喜欢追随三部曲的

前两部《少年巴比伦》、《追随她的旅程》。虽然路内在“天使”里表现的技法更显精湛,主题蕴含也更深,但却似乎没有了青春叙事的纯粹,阅读快感逊色了。

王安忆曾经这样评价路内:“路内小说的好处,在于他在书写青春的同时,无意间触碰到了上世纪90年代社会转型期工厂里的矛盾、世情和人心,没有观念先行、刻意而为,故显得松弛又自然。这是路内的价值所在。”

这句话我深有所感。表面看起来,“追随三部曲”中,打动我

的是路小路的青春故事。但其实真正打动我的是这青春背后的时代变迁,是他“无意间触碰到了上世纪90年代社会转型期工厂里的矛盾、世情和人心”。在上世纪90年代,中国曾经历过一次大规模的下岗潮,戴城化工厂青年工人路小路其实就是其中的一分子。他在时代浪潮中那种迷惘、动荡与不安,那种在追溯往事时的嬉皮笑脸,都难以遮掩曾经发生过的残酷。无论是下岗,还是失恋,路内的笔调都是轻松、幽默、调侃,可就是在这样的笔调背后,我们还是能隐隐约约读到失落与悲悯。巴尔扎克曾经说过一句话:小说是一个民族的秘史。今天的路小路的心理,也许能在“追随三部曲”的终结篇中读到。

读《重寻近代中国》

◎ 翁长松



难历程,史称“洋务新政”。

洋务新政是中国近代史上利用国家资本主义力量迅速发展和壮大国力的一次成功尝试。经过多年的发展,中国在19世纪70年代初期,现代轮船制造业、军械制造业等,已经从无到有,从小到大,利用西方技术,显著缩短了与西方制造能力的差

距。金陵机械制造局、江南制造局、轮船招商局、福州船政局、汉阳铁厂等一大批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企业发展迅猛,中国的经济构成也已经发生巨大改变,近代化的工业基础逐渐形成一个新的社会阶级即中国资产阶级也在缓慢成长。中国的政治架构尤其是法律制度经过30年调适,也在向世界靠拢。然而,以“中体西用”为指导思想的洋务运动虽然赢得经济高速发展,却依然不敌同期发展的日本,甲午战争结束后中国人痛定思痛,并将战败原因归结为清政府的洋务新政,错误地以为洋务新政不足以解决中国问题,而没有冷静地寻找到甲午之败的真正的主客观原因。甲午之败原因复杂,主要责任不在洋务新政,而在于清政府的“内耗”。胜败乃兵家常事,关键是要善于吸取教训,如

果当年清政府能以此为契机,推动中国的进步和发展,那么,不仅19世纪的最后几年将平安度过,而且势必为20世纪的中国发展创造一个良好的条件。遗憾的是,清政府内部的派系冲突,不仅无法对甲午战争的教训与后果达成共识,而且对中国的未来也缺少一种总体把握,逐步陷入无休止的内耗之中,使中国再次丧失了发展良机。

甲午战争后,一批先进的中国精英人物认识到中国不仅要学习和引进西方“船坚炮利”的先进技术,更要学习西方富强的根本体制。1908年,清廷宣布中国历史上第一部成文宪法《钦定宪法大纲》。这是中国历史划时代的大事件。然而,此举已晚矣,全国各省已对清廷失去改革创立君主立宪制的期盼,纷纷宣布自治。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宣告君主立宪制在中国政治舞台上破灭。

在书中,作者对慈禧太后、李鸿章、袁世凯等也作了颠覆性的诠释和评价。别具一格的评价,还有待史学界去深入探讨和研究。

今年是甲午战争爆发120周年,如何总结历史教训,洗刷民族耻辱,振兴中华,实现强国梦,已成为当今中国文化学术界关注的热点。由此,也引发了中国史学界对中国近代史进行新思考和新研究,涌现出一批颇具个性特色、让人耳目一新的史学读物。

中科院历史所研究员马勇先生《重寻近代中国》(线装书局2014年3月第1版)就是一本令人关注的读物。该书叙述了从鸦片战争到“走向共和”的百年历史发展轨迹,对中国近代史上发生的政治事件和条约等作出了重新思考和诠释。如在叙述《南京条约》、“洋务新政”的历史意义和作用时,作者写道:“《南京条约》给中国带来了巨大变化,是走上世界的开始……所谓五口通商,用今天的观点去理解,就是五个经济特区。”他认为遗憾的是清政府没有抓住机遇发展自己的工业和商品市场,错失了20年的良机,直至1860年,在经历了第二次鸦片战争打击后终于醒悟,才开始了向西方学习的艰